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论丛(十二)

孙中山研究论丛

SUN ZHONG SHAN YAN JIU LUN CONG

第三集

1985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

目 录

孙中山的爱国精神与对外开放思想	罗耀九 (1)
孙中山、章太炎革命思想比较观	吴雁南 (11)
论孙中山旧民权主义思想的铸新淘旧	周兴梁 (21)
孙中山与《民报》	
——论《民报》和中国民族的前途	林家有 (33)
论辛亥革命思想准备的若干问题	桑 兵 (51)
孙中山早期革命运动与香港	〔香港〕 吴伦霓霞 (67)
同盟会成立后南洋华侨资助孙中山武装起义的贡献	郭景荣 (79)
评孙中山前期的用兵方略	朱宗震 (98)
一九〇九——一九一一年间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李吉奎 (113)
辛亥革命期间的法国外交与孙中山	吴乾兑 (130)
孙中山的国际主义倾向	〔美〕 史扶邻 (139)
孙中山的五个统一主张和民初政局	段云章 (143)
孙文与日本的政治家、军人、浪人	〔日〕 久保田文次 (162)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孙中山在日的 革命活动与日本的对策	俞辛 焯 (170)
革命党领袖孙中山	
——对日本人看法的分析	〔日〕 狭间直树 (193)
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	冯祖贻 (200)
孙中山与黄兴	萧致治 (211)
论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的军事斗争	邱 捷 (222)
孙文的“大亚洲主义”和“亚洲大同盟”	〔日〕 山口一郎 (235)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孙文	
——以国民会议运动为中心	〔日〕 野泽丰 (241)

责任编辑：马庆忠

封面设计：何世德

孙中山的爱国精神与对外开放思想

罗耀九

一、对外开放思想是孙中山爱国主义的有机构成部分

孙中山的遗嘱一开始便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表明他的毕生志愿与实践都是为了祖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悲惨境况，他的遗著如《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等，都可以概括为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感情，这种感情的表现形式往往随着时代不同、境况不同而不一样，但是，孙中山的学习西方，对外开放的思想却融合在爱国思想之中，在他一生的言论中经常表达出来。孙中山在少年时期便对祖国怀有浓厚的感情。他虽然是一个土生的农家子弟，然而并非土长，十二岁就随母远涉重洋，至檀香山侨居。如一般华侨一样，他虽身在异域，常怀家邦之念。稍长回到故乡，对比两地生活，优劣之差异深有感触。但他没有因家乡的贫困而厌弃家乡，而是力图贡献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早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他便利用课余时间写稿投港、沪各报刊，鼓吹改造中国政治。他非常重视学习国外经济建设经验，曾给香山县的大绅士退休官员郑藻如写信，介绍自己了解西方，“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他陈述建设乡梓的意见：一是组织兴农之会劝导农民“兴蚕桑之利”；二是成立戒烟局，劝戒吸鸦片；三是多设学校以培育人才。他指出，当时中国文盲太多，“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①这番话虽然是针对家乡的建设而言，但其意义却有全国性。他自己也说：这三件事“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若能逐步推广，全国都将受益，盼望郑藻如能赞助提倡。

他还写文章呼吁重视农业，仿效西方设立农部，推广耕作良法，派人去欧洲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腴^②。这些建议充满爱家乡爱祖国的感情，表明年轻的孙中山以天下之忧为忧，不是一个只谋私利的庸人。

由于爱国感情的驱使，孙中山以一介书生敢于向当朝一品、显赫的大官僚李鸿章上书言事。这在腐朽衰败的晚清时期是不合时宜的。然而孙中山并不考虑个人得失，想方设法把意见书送到李鸿章之手。

①②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第1—2、4—5、8页。

孙中山指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呼吁仿泰西之法行保商之政。而洋务派“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①。这几句话把洋务派所夸耀的功绩打了折扣。李鸿章当时正专注于中日战争,无暇计较。孙中山虽未见到这位大人物,但他爱国之心未减,以更大的激情决定选择另一条艰难而危险的道路——革命——去达到救国的目的。

如果认为孙中山上书不成功便去革命,那是把孙中山的思想看得太简单了,也是不理解孙中山百折不挠的毅力。孙中山固然不会象康有为那样把向皇帝上书看作唯一的救国门径。但他也决不会一次不成功便放弃希望。促使孙中山放弃这条改良道路的重要因素并不是李鸿章的拒见,而是他北上观察之后,更深刻地认识到清廷已衰朽到不可救药了。这是孙中山的思想远远超越康有为等人之处。在上书李鸿章之后的第三年,即一八九七年,康有为等正在热火朝天地从事维新运动,而孙中山却摒弃了对清廷的任何幻想,坚决的断言:“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一开始用欧洲人作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支援)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仅仅只是铁路,或是任何这类欧洲物质文明的应用品的输入(就是这种输入如那些相信李鸿章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可行的话),就会使事情越来越坏,因为这就为勒索、诈骗、盗用公款开辟了新的方便的门路。”^②

孙中山的上述结论是以许多事实为依据的。中国人民在这个腐败的官僚机构统治之下,“遭到四种巨大的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③。孙中山所观察到的大量事实,使他不仅对洋务派头子李鸿章不再存任何幻想,也不对其他任何官吏以至于皇帝抱任何希望。他说:“在英国,有人以为只要能说服李鸿章等人,使他们相信铁路、电话、欧洲陆军组织等的效用,启发中国人民,并设法把整套文明机器输入中国,那末中国的新生就会开始,这真是和使吃人的野兽改用银制餐具,想藉此把它们改变成素食者是同样的荒唐!”^④输入西方文明虽然很有必要,但没有前提是不行的,前提就是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

孙中山当时的调子曲高和寡。他在美洲各地不知疲倦地向华侨宣讲“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的道理。“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⑤。

海外如此,国内可想而知。甲午战争之后,爱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幻想他能变法图强,以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只是到了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爱国者才开始陆续放弃改良主义道路,投入排满革命的行列。按照孙中山的观察,当时参加反清斗争的有三类人。第一类为“因官吏的勒索敲榨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⑥所谓“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

①②③④⑥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88、89、103—104、253页。

⑤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194—195页。

识”，即指不以反对官吏压迫 种族压迫为最终目的，而有更远大的斗争目标——建立一个富强康乐的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在一九〇四年就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①

要实现这样一个美丽的前景，当然不是依靠别人的力量。孙中山说：“拯救中国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②但这决不等于不要外援。孙中山在强调依靠自己力量的前提下，充分认识到争取外援的重要性。他说：“为了确保我们的成功、便利我们的运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我们必须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的人民呼吁，要求你们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③这一番话固然是为了反满革命的需要而言，但应该看作是孙中山救国手段之一。他曾经多次提到争取外援。早在一八九六年，他初访英国伦敦之时，便向英国的汉学家翟理斯表示：“久欲访求贵国士大夫之谘敝邦文献者，以资教益；并欲罗致贵国贤才奇杰，以助宏图。”^④在孙中山刚刚开创革命事业之时，他非常需要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得到国际友人的帮助。他曾经对《伦敦被难记》俄人译者说：“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但是，他接着申明：“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⑤他决不是认为外国什么都好，自己一无所长，而是要取长补短。对于那些不肯学习外国长处、担心会丧失国民的独立性的同志，孙中山教导他们不必有此杞忧。他说：“中国此时的改革，虽事事取法于人，将来他们各国定要在中国来取法的。如美国之文明仅百年耳，先皆由英国取法去的，于今为世界共和的祖国；倘是仍旧不变，于今能享这地球上最优的幸福不能呢？”^⑥他对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说：“诸君之来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若中国以其固有之文明，转而用之，突驾日本无可疑也。”^⑦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认定中国经过改革之后，将来会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这是孙中山进行国际交往中的正确态度：既虚心吸取外国的长处，又始终保持民族的自尊心。

如果单纯从道义上乞求，帝国主义列强是不会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当时无论是英、美、日，或俄、德、法，都想利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向中国攫取权益。推翻这个旧政权并不符合它们的利益。然而，当它们观察到中国的革命势力方兴未艾时，也会在一定的条件下考虑给新生力量一些友好的表示，以便一旦新政权诞生了，易于与之建立亲善的关系。孙中山正是利用列强的这种心理开展争取外援孤立清政府的活动。他抨击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与盲从排外思想，宣言未来的革命政府将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以促进国际交往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是当时他流亡海外所能从事的一项有意义的革命工作。不管成效如何，不能把他的这种活动视为幼稚的幻想。

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友好人士是能够站在正义的立场资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如孙中

①②③④⑤⑥⑦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55、47、86、281、282页。

山在伦敦蒙难,得到康德黎夫妇、英籍工人柯尔、英籍普通妇女霍维太太等的竭力帮助才幸免于难。兴中会刚成立时,丹麦人柏先生承担了教练兵操的任务。美国人咸马里担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在旧金山协助训练救国青年,追随孙中山多年。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时德臣西报主笔黎德、士蔑西报主笔邓肯协助起草英文对外宣言。惠州起义时日本人山田良政帮孙中山送信,在归途中不幸牺牲,为中国革命而捐躯。据孙中山自述,日本志士资助中国革命者“尤以久原、犬冢为最。其为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则有山田兄弟、宫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为革命尽力者,则有副岛、寺尾两博士。……其他间接为中国革命党奔走尽力者尚多”^①。还有法国武官布加卑、法国领事罗氏等人。他们对中国革命都表同情,乐意赞助中国建立民主政权。他们的支持使孙中山更加坚定,不屈不挠地从事拯救祖国的革命事业。

不过,当时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国际友人毕竟寥寥可数,漠不关心的、心怀疑虑的、甚至是反对的,占大多数。其中有人散布黄祸论,以破坏欧美人士对中国的友谊。孙中山对这种无稽之谈曾予以驳斥。

二、因批判“黄祸论”而提倡对外开放

所谓“黄祸”,指的是十三世纪成吉思汗指挥的蒙古骑兵纵横驰骋欧亚大陆,给欧洲人所留下的征服者的印象。几百年过去了,漫长的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包括蒙古族)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对中华民族稍有认识的人是不会担心会在二十世纪出现什么“黄祸”的。美国公使芮恩施在《论远东的思想潮流和政治潮流》一文中便指斥“黄祸”的谈论是“空幻离奇”的。中国“有肥沃的土地和富饶的江河,有高山和平原,丘陵和溪谷的无穷变化,有各种各样的气候和条件,地面上生长着一个民族所需要的一切,地底下蕴藏着从没有开发过的无穷的财富”。^②中国人没有必要去掠夺、侵略别的国家。孙中山说,从前中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强国之时也没有压迫过四邻的弱小民族和国家。当时许多民族和国家“拜中国为上邦,要到中国来朝贡”,并不是中国“强迫他们来朝贡”,而是“他们怀中国的德,甘心情愿,自己来朝贡的”。^③“朝贡”实质上是一种贸易形式。这是彼此有利的经济活动。同时也是增进中外友好的方法。在中国强盛的时候,这种国际交往的活动更多。孙中山以历史为证,强调“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恶意歧视”^④。“唐朝最盛时代,外国人派遣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如意大利、土耳其、波斯、日本等国是彼时外国人到中国来,我中国人不反对”^⑤。那时候外国传教士也来中国传播福音。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日渐繁盛,“甚至晚至明朝时,中国人中还没有丝毫排外精神的迹象,当时的大学士徐光启,其本

① 《孙中山选集》,第197页。

② 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

③ 《中山丛书·大亚洲主义》第三册,第276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50页。

⑤ 《中山全集分类索引》上册,第1196页。

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曾深得人民的尊敬”。中国人是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历史事实证明了所谓“黄祸论”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谬论的真实意图是希望中国衰亡，害怕中国“觉醒起来并采用西方方式与思想”，妄图“尽可能地压抑阻碍中国人”。孙中山指斥这些“黄祸论”者不仅道德有问题，经济观点也是错误的。“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增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能说这是灾祸吗？”^①“同时，中国天然富源的开发，会增加整个世界的财富。”^②事实将证明，中国经济如能发达，不但不会影响西方的贸易，相反，将会大大地开拓西方商品的市场，“从经济上看”，事实将证明不是“黄祸”，而是“黄福”。从政治方面考虑，西方也应该看到：“如果是由真正的中国人自治，他们就会和外国人和平相处，并且也将和世界人民建立起友好关系。”“中国如能免于分裂，那么，象由于土耳其的分裂而引起的欧洲的严重纷扰，也就可以避免了。”孙中山还进一步揭穿帝国主义分子叫嚷“黄祸”的真正目的是想使中国成为附庸，受其操纵，“作为满足该国本身野心的工具”。只有在那种情况下，“中国人才会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③各国可以无须顾虑，放心地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往。

三、为启发民智而对外开放

一个国家为什么贫弱？当然，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是个重要的因素，但那是外部的因素。如果专谈内部的原因，孙中山认为有四个方面：“有以地小而贫者，有以地瘠而贫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④而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中国领土辽阔居世界第四位；物产丰富、人口众多都是居世界第一，“而人民之聪明才智自古无匹，承五千年之文化，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尝为世界之雄矣”^⑤。孙中山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首先是“官吏贪污、政治腐败”，其次是长期养成的孤立性。“故从来若欲有所改革，其采法惟有本国，其取资亦尽于本国而已，其外则无可取材借助之处也”^⑥。一说改革就离不开商鞅、王安石的变法故事；要不，就是管仲、韩非子的千古名言，至于西方近代的先进经验则茫然无知。孙中山批评这种思想，“犹孤人之处于荒岛……而不知有社会互助之便利，人类交通之广益也”^⑦。这种孤立性，是与清朝政府盲目排外的闭关政策分不开的。满清贵族入关以后，为了巩固他们对各族人民的统治，“尽其可能地使被征

①②③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53—254、106、253页。

④⑤⑥⑦ 《孙中山选集》，第186—187页。

服了的人民愚昧无知”，“以免中国人因与外国人接触而受其启迪并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①。他们“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是以除本国外，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是故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②。所以，“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③。但是，由于清廷长期执行闭关政策，流毒深远。孙中山说：“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挠。……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④这种无知病危害甚大，因为它使中国“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⑤。“中国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则虽尧舜复生，禹皋佐治，无能为也。”^⑥

中国要强盛只有先消除闭关主义，实行开放主义，像日本一样。在破除闭关思想时，孙中山强调事事取法于人，因为非如此，不足以振聋发聩，使闭塞者开通起来。到了民国成立之后，他写作《三民主义》的时候便不作此偏颇之言了。他指出：“外国政治哲学的进步，不及物质进步这样快的。……如果我们仿效外国的政治，以为也是象仿效物质科学一样，那便是大错。……我们要学外国，便要把这些情形分别清楚。”^⑦孙中山能够冷静地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正确地引导人民去认识西方，学习西方。这是他的爱国思想比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更为高超之处。

四、对外开放与“门户开放”的区别

对外开放与“门户开放”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历史含义，绝不可混为一谈。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一次又一次地强迫清廷开放一些城市为通商口岸。以租界、租借地的名义强占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它们侵犯中国的主权，在通商口岸中享受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为了在分割中国的争夺中，美国能享有均等权利，它向我国提出所谓“门户开放”宣言。这个“宣言”既承认列强在华的任何既得利益，又要求它们的势力范围向美国开放。这个“宣言”是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一条新锁链。

孙中山主张的对外开放与“门户开放”截然不同。

孙中山长期流亡在海外，有机会观察研究欧美及日本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过程，深刻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要迅速发展，必须对外开放，贫弱的国家更要充分利用外才外资。他这个思想在武昌起义之前已多次见于言论之中。至辛亥革命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孙中山在回国途中便游说英、法等国，希望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

①②③④⑥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50—251、51、251、15—16页。

⑤⑦ 《孙中山选集》，第187、762页。

中国兴办实业”。又说：“中国人民号称四百兆，物产丰盛甲于全球，外资输入自如水之就壑，吾等当首先利用，以振兴其工商业”。“总之，新政府之政策在令中国大富。”^①

但是，外商一定要有利可图，才肯来华投资，否则，他们会裹足不前。所以孙中山对巴黎《政治星期报》记者表示：“新政府于各国通商一层，更为注意，当弃除与外人种种不便之障碍物”^②，以消除外商的顾虑。但是，这种通商是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过去外人控制中国海关关税的侵略行为，不允许再存在下去。孙中山要求“海关税则须有自行管理之权柄，盖此乃所以保其本国实业之发达，当视中国之利益为本位”^③。“新政府应将海关税则重行编订，务使中国有益，不能徒使西商独受其利。”^④他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会谈时也提到：“想重新掌握海关及其税收。”^⑤。协定关税是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一。孙中山想通过谈判予以取消。至于其他不平等条约，“新政府仍然承认”，以避免激起列强对革命政府采取敌对行动。当时孙中山很害怕外国干涉中国革命，他说：“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⑥在反清革命尚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不可树敌太多。但是孙中山也不是无原则的妥协。他警告列强：如果中国的独立与领土受到侵犯，中国将采取“拒用外货办法”，使侵略者在经济利益方面受到还击^⑦。这是孙中山在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维护国家的领土与独立所能作出的声明。

孙中山回到上海之后，外国记者问他，将如何对待治外法权。孙中山果断地回答：“各种改革完成时，政府当立即取消领事裁判权。”^⑧很显然，他从前所说的承认不平等条约，是出于外交上的权宜之计，有一定的时间性，将区分缓急先后，逐步废除，并非永远承继清朝政府的可耻的“遗产”。晚年，他更明确地表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⑨，同时又不遗余力地鼓吹开放主义。这足以证明孙中山的开放主义是爱国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清廷屈辱地接受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对立的。

孙中山主张借外债，是以维护主权为前提的。他说：“埃及所以借外债而亡国者，失主权故也。美国初独立时亦借外债，而美国之能兴者，则不失主权故也。”^⑩中国人民因为过去清政府大借外债，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因而“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鸩毒，不知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美洲之发达，南美、阿根廷、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⑪外债只要是用途得当，有利生产，就不愁还不起债。孙中山说，“十年之后，则外债可以陆续偿还”^⑫。如借债修铁路，“三年收入，已可还修路之本，此后每年所进皆为纯利。”所以借外债决非坏事。问题在于借债的条件与向谁借？如“借债立约得当，则永不失败。”^⑬“满清借债之弊窦，第一则丧失主权，第二则滥用无度，第三必须抵押。”孙中山认为借债的原则是：“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⑭要能符合这三项，必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⑩⑪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0、561、564、569、582、568、565、565—566页。

⑨ 《中山丛书》第四册，附录，第3—4页；第三册，第282页。

⑩⑪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第322、391页。

⑫ 《孙中山选集》，第191页。

须能利用资本主义金融家之间的自由竞争,以选择最有利的借债条件。如果各国金融家联合起来,借方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所以孙中山反对西方可能出现的“如同四国银行团那样强而有力的财团”。因为“此一财团的目的,只不过想强迫中国接受某一种已议定的财政政策,而与中国的真正利益相冲突,且可能演变成为控制中国财政和债务的工具”^①。但是,如何才能有效地破除资本主义财团的控制?孙中山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是落后的贫弱国家所遇到的有共同性的难题。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孙中山对上海金融界人士说:“鄙意更拟联合多数银行,与法国资本家合资创一极大银行……发行债票,任外资之输之,则全国金融枢纽操之于己,即政府借款亦可担任,不致受非法之要挟,而利益亦不致入外人之手矣。”国内资金不足,则向南洋华侨招集股份。“将来矿产、铁路、机厂诸大政,自可次第举行,而吾国富强可与美国相抗衡矣。”^②孙中山时时刻刻把借外债与促使国家富强的目的紧密相联。如果外债的条件苛刻,要求非分的权利,他决不俯仰由人,而是另辟蹊径,走自力更生之路,体现了爱国者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防止外债非法要挟的另一办法是欢迎外资。借外债的目的在于获得外汇或外币以购买国外的技术设备。如果能直接引进外国闲置无用的机器与生产技术,既可不受财团的要挟又同样能达到目的。孙中山在答复群众来信中说,不要把资本单纯看作金钱。“中国今日所缺之资本,非金银也,乃生产之机器也。欲兴中国之实业,非致数十万万匹马力之机器不可。然致此机器非一时所能也。经济先进之国,以百数十年之心思劳力而得也。经济后进之国,以借外资而立致之,遂成富国焉。……今日欲谋富国足民,舍借外资无他道也。”^③当时正是民国初建,人民对清廷出卖路权矿权之事记忆犹新,一谈到让外国人来办实业,莫不顾虑,以为这种主张与清廷无异。孙中山耐心地解释:“鄙人主张用外人办理工商业,及订立一定之期限,届时由我收赎,并非利权永远落于他人之手。惟我国以卖路卖矿皆为世所诟病,故于此事无敢主张。然鄙人敢保此事有利无害。日本行之已获大利。此又彰明较著者也。”^④孙中山还回顾了清末的争路运动,颇为感慨,认为那是“争其小而遗其大”。他说:“夫吾人所当争者主权也,非路权也;倘主权不失,路权虽授与人,不失其利也;倘主权旁落,路权争回,不能免其害也。”他大力宣传要“舍路权而争主权;一旦主权恢复,我便可大开门户,欢迎外资,放任路权,同力合作”。^⑤孙中山力排众议,言人所不敢言,如果不是受爱国热情所驱使,很难有这样的勇气。

五、对外开放是宏伟的《实业计划》的构思基础

一九一八年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失败了,他不得已离开广州,回到上海。他对于时局没有

①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5—566页。

②⑤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49—550、567—568页。

③④ 《中山全集分类索引》上,第1199、1194页。

具体办法，在苦闷之中，只好“杜门养晦，聊以著述自娱”^①。一九一九年他陆续发表《实业计划》的中文译稿。在“自序”中说：“欧战甫完之夕，作者始从事于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而成此六种计划。盖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且以助各国战后工人问题之解决。”^②把写这本书的动机与作用都交代清楚了。为了在欧美能够广泛传播，书是用英文写的，并请他的老师康德黎协助在英国出版，发行后向欧美各国政府分送。

这部书可说是一个宏伟的国民经济近代化的建设方案。孙中山虽然是在欧战结束后才开始执笔，他的构思却远在好几年以前。至少在民国成立之时，这些思想已初具轮廓。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间，他曾发表演说五十多次谈经济建设问题。他以为共和国成立了，政治问题已解决，接下来就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他说：“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③孙中山的话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改变自己国家贫弱状况的决心，也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民族工业的愿望。他的《实业计划》规模宏大，以“铁路为命脉”，疏浚内河航道；以农业为中心，移民垦殖边疆地区；建设沿海商埠与港口。把采矿、钢铁和机器制造业看作“工业之根”、“实业建设之母”。同时重视发展轻工业，以满足人民生活之需要。

但是，要实现这个建设计划必须具备资本与人才、劳力与市场四项基本条件。中国人口众多，不缺劳力；国家建设的开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提供了市场。所缺者是资本与人才。孙中山认为，如果完全靠自己培养人才，“我们中国就要先派十万留学生到各国去留学，至少亦要学十年方能回国办理建设各项事业”^④，就太慢了，“只有采取开放主义，才能满足建设的需要”。“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的功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这是拯救贫弱，发展实业的一条捷径。孙中山想走这条捷径。所以他的《实业计划》首先是要争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有关人士的帮助。

孙中山认为“中国实业之发达，固不仅中国一国之益也，而世界亦必同沾其利”^⑤。欧洲大战后那些闲置无用的制造武器的机器，可转为民用工业，制造中国建设所需要的机械，“开发中国潜在地中之富”，“则中外利益均沾”。^⑥中国实业计划的执行，可“使中国开一新市场，既以销其自产之货，又能销外国所产，两不相妨”。外国资本家不必顾虑中国会与他们竞争市场。孙中山甚至说，如果“规划果能逐渐举行，则中国不特可为各国余货消纳之地，……其资本有余者，中国能尽数吸收之”^⑦。孙中山认为，由于中国执行计划对于外国投资者也有许多好处，他的计划必然可以得到外国资本家的赞助。但是，他要求外国银行先遵正当之途，得中国人民之信仰，然后与政府订契约，不要重蹈清末盛宣怀铁路国有政策之覆辙。对于雇来的外

① 《孙中山年谱》，第231页。

②⑤⑥⑦ 《孙中山选集》，第212、191、215、215—216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22页。

④ 《中山全集分类索引》上，第1198页。

籍专家,要求他们教授训练中国的助手,以便将来可以接他们的班。等到外债本利清偿之后,“对于所雇外人当可随意用舍矣”^①。雇用什么人,是按我们自己的计划决定,“我有计划,则我始能用人而可免为人所用也”^②。计划不需要的人,不能让别的国家硬塞进来。用人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孙中山特别注意引用外才以发展机械工业。他非常同情中国劳动者的繁重体力劳动与待遇微薄的悲惨境遇,想以机械代替手工劳动,提高劳动效率,以增加工资。所以他说:“若外国资本不可得,至少亦须用其专门家、发明家以为吾国制造机器。无论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也。”^③孙中山概括他的对外开放目的,是“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④。不管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为何物,但他为争取外援以振兴祖国的爱国热忱,无疑地在当时与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

六、结 语

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要想迅速发展生产,赶上先进工业国家的行列,首先碰到的难题是短期内无法集中大量的民族资本,没有先进的技术,缺乏管理人才。孙中山深知这个困难,所以不厌其烦地强调要借外资 借人才。他何尝不知道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所起的坏作用!他决不会去饮鸩止渴,但也不愿意因噎废食。他希望能化害为利,或至少能达到弊少利多。所以他反复强调借债不能有损主权;外债要用于生产事业。但是,要能够按照这两项原则办事,首先要有强有力的民主政府。当时中国军阀纷争,政局混乱。帝国主义通过它们所操纵的军阀,向中国投资,不仅要攫取高额的经济利益,同时要取得政治上的特权。华侨则望而却步,不敢回国投资。孙中山的理想无法实现。在他的晚年曾检讨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急于建设,不能待破坏之完成”,“陈腐的官僚统系未予扫除”,“已破坏者一专制政治,而今有三专制政治起而代之,又加恶焉!”^⑤最后他不得不将实业计划的理想搁置起来。首先集中力量于“打破军阀”,“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只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⑥。在中国争取到真正的独立之后,才能谈利用外国资本以建设中国,以加速中国工业化。

孙中山的理想没有实现,并非就是“空谈”。孙中山的遗愿不能实现,不是由于他的“空想”,而是他的不肖党徒背弃了他的革命主张。而他的理想已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逐步实现了。在某些方面已远远超过他当年的理想。

①⑥ 《孙中山选集》,第218、964页。

② 《中山全集分类索引》上,第1210页。

③④⑤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317、338、427页。

⑥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317页。

孙中山、章太炎革命思想比较观

吴雁南

在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革命运动中，孙中山和章太炎无愧为时代的巨子。但是，这两位巨人并未同步前进，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继续探索着革命的真理，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声名仅次于孙中山、黄兴的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以后却逐渐失去光彩，终至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同样是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为什么其归宿会出现这样大的差异，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为了便于对这两位资产阶级领袖人物的不同归宿的原因作一些探索，有必要对他们的革命思想作一些粗略的比较。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章太炎看作缺乏民主思想的人物，或者干脆称之为地主阶级反满派。如果认真研究一下章太炎的基本言论和行动，就可以看出这种结论与实际存在距离。应当肯定，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纲领渗透着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他的旧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革命旗帜。同时也应当看到，与他合作的黄兴、章太炎不仅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①，而且就思想水平而言，亦达到相当的高度。

（一）就民族主义思想而论，孙中山首先高举“振兴中华”的旗帜^②，号召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急起投入救国救民的运动。他说“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③这表明他的民族主义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思想。虽然《兴中会盟书》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词浓烈地反映了他的“反满”情绪，但是孙中山的这一口号的确是同反对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团运动的被镇压，清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把“结与国之欢心”奉为无上原则。资产阶级革命派

① 尽管孙、章之间清末曾经出现分歧、磨擦，从总的看那只是革命党人内部的派系斗争。对此，拟另文专论。

②③ 《孙中山全集》第一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第19、21页。

感受到：外国挟制清政府奴役中国人民，清政府则依恃洋人的侵略势力维持其反动统治；中国人民的革命“对内即所以对外，对外即所以对内，一而二、二而一也”^①。反帝与反满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由于帝国主义采取了比较温和、隐蔽的侵略方式，人们把斗争锋芒集中到清政府。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强调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满族统治者的暴政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他为实现民权主义、民族主义而奔走呼号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国家要富强，民族要独立，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统治者，创建民国。

当然，毋庸置疑，孙中山的“反满”口号因袭了资产阶级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他的“反满”口号深深打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烙印。但是，他反对种族复仇主义。当他听到有人讲“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时，就指出，“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决无寻仇之理。”^②孙中山所谓“反满”，实质是反满族贵族，即满族统治者，而不是反对整个满族。因此，后来他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里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民，是曰民族之统一。”^③当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表现出较大的局限性。他没有正面地明确地提出反帝口号，甚至幻想帝国主义容忍和支持中国革命；表示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照旧偿付清政府的外债，宣布在革命时不发生“妨害”帝国主义的行动。

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则具有强烈的反帝思想。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被镇压，《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实，使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所加深。他写道：“至于帝国主义，则寝食不忘者，常在劫杀，虽磨牙吮血，赤地千里，而以为义所当然。”^④它们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其烈千万倍于满洲”^⑤。他渴望中国独立，收复被帝国主义侵夺的领土主权，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当德国在山东加紧掠夺中国矿山时，他就号召“山东士民，为义和团，无为衍圣公”^⑥，要人们拿起武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决不屈膝投降。他期望亚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一九〇七年四月，他和其他革命党人一起，同朝鲜、印度、缅甸等国的革命者，在日本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种族”，以“相互扶助，以各得独立自主为旨”。他要求革命党人丢掉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不隐瞒自己反对列强侵略的主义，在《答祐民》一文里写道：“藉援强国，冀以自全。在品格则为下劣。在事实则无秋毫之效。愿足下勿作此迷梦也。……今于事实，未尝显召白人之忿，岂在主义之宣布否耶？若循主义言之，纵除去越南、印度等事，但言中国独立，……即此足招其怒矣。欲令白人无怒，惟有钳口结舌，勿吐一言耳。《民报》……所云‘要求世

① 击椎生：《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云南杂志选集》，第546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5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第2页。

④ 《五无论》，《民报》第十六号。

⑤ 《革命军约法问答》，《民报》第二十二号。

⑥ 《中国之川喜多大尉袁树勋》，《民报》第二十四号。

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者，此本含混言之。要之列国政府，必不赞成；唯列国之个人为可。所云‘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者，已明何不维持世界之伪平和。真正平和之谓何？曰：‘使欧美人不得占领亚洲，使亚洲诸民族各复其故国而已。’此条主义，往日尚未宣明，今仆始有意发明之。”^①应当说，他的反帝思想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是相当突出的。

至于他的“反满”思想，无可讳言，具有浓厚的封建的种族主义情绪。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勃兴和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了解，他的“反满”思想逐渐发展而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提出了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主张。他在《〈社会通论〉商兑》一文里写道：“民族主义者与政治相系而成，非脱离政治之外，别有所谓民族主义者。”进一步指出这种民族国家建立后则必“尽破宗法社会，使人人自竞为国家御侮之术”^②。后来，在《致留日满洲学生书》中，他进一步发挥了上述观点，认为革命成功后，满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是一律平等的。

这说明，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张基本是一致的。

(二)就民权主义思想而论，孙中山首先提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他说：“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③为了防止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弊端，又从中国古代的制度中觅得“考试”、“监察”两种制度，加上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合称五权。他认为五权分立，“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④尽管自由、平等、博爱，在当时的西方已成为虚伪的口号，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却是革命的进步的。

章太炎的民主主义思想同孙中山相比，虽有所逊色，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却是民主共和政治的拥护者。一九〇三年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里写道：“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以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同年六月，他在同柳亚子、蔡治民、邹容合写的《驳革命驳议》一文里说：“使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毋宁死之主义，以自立于搏搏大地之上，与文明公敌相周旋，则炎、黄之胄，冠带之伦，遗裔犹多，虽举扬州十日，嘉定万家之惨剧，重演于二十世纪之舞台，未必能尽歼我族。不然，逆天演物竞之风潮，处不适宜之位置，奴隶唯命，牛马唯命，亦重蹈红夷棕蜜之履辄而已！”在这篇文章里，还明确指出，在推翻清朝之后必须“实行共和主义之政策”^⑤。他《在〈民报〉纪元节大会上的演说》中力主“平民革命”，批驳了依靠地方军阀势力——督抚反清的言论，大声疾呼：“从今以后，请把依赖督抚的一念，早早打消。但想当兵，不要想当奸细；但想做将士，不要想做参谋。这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

① 《答祐民》，《民报》第二十二号。

② 《民报》第十二号。

③④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6—297、331页。

⑤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28—230页。

立。”^①他所说的平民革命，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主编的《民报》坚持了该刊的“六大主义”，即孙中山制订的同盟会的革命宗旨。当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封禁《民报》时，他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示为了维护《〈民报〉简章》的“六大主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②。由于《民报》坚持革命宗旨，才被人看作革命党的旗帜。章太炎也同孙中山一样，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在不少政论文章里对资产阶级议会制进行了揭露、批评，并提出对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意见^③。比较集中地系统地表述其关于资产阶级政治体制观点的，却要算《代议然否论》一文。他从欧美和日本的议会制看出，选举权既是以财产为基础的，纳税多少来确定的，选举出的议员必定是富豪；这些富豪原是压迫剥削平民的，由他们组成议会，更不利于人民。他强调指出：这些人当了议员必然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议员那样为所欲为，“其尊与帝国之君相似”，中国“尚不欲有一政皇，况欲有数十百议皇耶？”他还从贯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出发，认为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实行议会制，势必分州，破坏民族国家的统一；再就是议会有制订法律之权，要求代表富豪利益的议员“以土田平均相配”，实行平均地权，也是不可能的。不要议会会使政治制度不与三民主义“相抵牾也”。主张在推翻清朝以后建立一种没有常设议会的民选总统制，提出了以总统为元首的行政、司法、学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④他主观上要求防止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流弊，其主张却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范围。

在思想文化方面，章太炎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总代表——孔子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一九〇六年九月发表的《论诸子学》把他对孔夫子的批评推到一个高峰。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矛盾的一个侧面，表现出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文化束缚的愿望。应当说，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他是很突出的。

（三）就民生主义思想而论，按照孙中山的说法，他的这种思想形成于一八九七年。他后来自述，在英国伦敦期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⑤。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一开始即有两大特点：一是“土地国有”，一是“耕者有其田”。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写道：“在己亥庚子间，与章太炎、梁启超及留东学界之余等聚谈时，恒以我国古今之社会问题及土地问题为资料。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其对于欧洲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佐治（Henry George）之单税论。是为土地公有论之一派。”^⑥这里明确告诉人们，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形成，不仅受国外影响，而且是同中国传统文明紧密相关的。从梁启超、

① 《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第415页。

②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485页。

③ 参见章太炎《记印度西颉王纪念会事》、《五无论》、《定复仇之是非》、《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与马良书》等文。

④ 对章太炎这一主张，下文再作评述，此从略。

⑤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196页。

⑥ 《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06页。

章太炎、冯自由的著述看,孙中山的确曾打算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土地国有”。久保文田次《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论》一文认为:“初期的平均地权论考虑过没收地主所有土地的可能性,是不能一概否定的。”^①应当说,这一意见是中肯的。至于“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据载一九〇二年春,他就同章太炎讨论了改革土地、赋税的问题,提出制订法律按人口分配土地的设想,明确指出:“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贡彻不设,不劳收受而田自均。”^②一九〇三年孙中山即多次正式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经过《〈民报〉发刊词》、《军政府宣言》、《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等文的阐释,他的民生主义思想已有完整的体系。“土地国有”与“耕者有其田”似为其中的核心。他访问第二国际执行局要求参加第二国际、陈述其政纲时,表示他要实行“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③上述内容最初见于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因所报导的有许多并非原话,又经辗转翻译,对孙中山的观点的表述是否完全准确,尚待进一步研究。从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同袁世凯谈话提出“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④看,他是一直具有“耕者有其田”思想的。至于“土地国有”,在《〈民报〉六大主义》中遂自将土地国有与平均地权等同起来。孙中山左右的胡汉民更发表激进言词,谓“土地国有”必将使“地主强权将绝迹于支那大陆”^⑤。可见,比利时社会党《人民报》的报导大体上是可信的。但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孙中山尚未将“耕者有其田”明确作为一条政纲;同时表示不赞成采取激烈手段夺富人之田为农民所有,而是用社会改良的办法实行“平均地权”。

众所周知,注意农民问题,是章太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前边已经提到,早在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间,他就同孙中山多次讨论农民问题。载于《庵书》中的《定版籍》一文,就是他们讨论的记录。他同孙中山一样,都很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他赞成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他说:“善哉!田不均,虽衰定赋税,民不乐生,终之发难。”^⑥在此所谓的“均田”虽同古代的均田制不无渊源,却已深深地打上资产阶级的思想烙印。他首先要求打击封建土地所有制,企图实现“耕者有其田”。他写道:“凡露田,不亲耕者使鬻之,不墾者鬻诸有司。诸园圃,有薪木而受之祖、父者,虽不亲殖,得有其园圃薪木,无得更买。池沼,如露田法。凡寡妻女子当户者,能耕,耕也;不能耕,即鬻。露田不得佣人。”^⑦如果按照他的主张,封建地主的土地必须按规定出售。农民贫无所有、无力购置土地,地主的土地势必售与政府。这样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则一变而为资本主义国有制,并进而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个办法如果实行,必将给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很大打击,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开

①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总2415页。

②③ 《孙中山全集》第一集,第213、273页。

④ 《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上卷,第123页。

⑤ 《民报六大主义》,《民报》第三号。

⑥⑦ 《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第269、270页。